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害死人”的形式主义，根源在政绩观

王富军

形式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是损害党群关系、败坏党风政风的顽瘴痼疾。形式主义的根源，正是政绩观的错位。

当政绩观偏离为民初心、背离客观规律，将个人名利、短期效应凌驾于人民利益、长远发展之上时，形式主义便会随之滋生蔓延。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必须深刻把握形式主义与政绩观的内在关联，把力戒形式主义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务实作风，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引领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形式主义实际上就是用外表掩盖矛盾

形式主义是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具有隐蔽性和变异性。形式主义极端夸大事物的表面形式，不讲实际内容和实际效果，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格格不入。

从本质上看，形式主义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在工作作风上的集中体现，是内容与形式关系颠倒、手段与目的关系错位的必然结果。

形式主义重形式轻内容，与党的思想路线格格不入，本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作祟，是内容与形式、手段与目的关系颠倒。

当前，形式主义表现多样、不断变异：有的知行不一、不求实效，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的调研走过场，看“盆景”、听汇报多，接触群众少；有的热衷数字政绩、材料政绩，虚报数据、美化报表；有的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推诿扯皮；有的过度留痕，基层陷入填表迎检的循环；有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层出不穷。

种种表现，核心都是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留痕轻实绩，用形式代替落实，用外表掩盖矛盾，根源在政绩观错位。

形式主义“害死人”

形式主义的危害极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大敌”“害死人”等严厉措辞强调其危害性。

从政治维度看，形式主义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

从党群关系看，形式主义将群众利益置之度外，用表面功夫敷衍人民群众的期盼，让政策红利难以真正落地，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筑起一堵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使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从干部成长维度看，长期深陷形式主义的干部，容易丧失问题意识和实干能力，习惯于浮在表面、回避矛盾，最终在思想上滑坡、能力上退化，难以担当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从事业发展看，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违背规律，导致决策部署与基层实际、群众需求脱节，诸如盲目上马“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贻误工作、错失发展机遇，给后续工作留下诸多后遗症。

具体而言，形式主义主要有六大危害：贻误工作，脱离实际、务虚不务实，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搞不上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不了；疏离党群干群关系，高高在上、拒群众于千里之外，调研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给群众带来额外负担；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造成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等不良风气蔓延；腐化干部，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现象，让踏实干事者心寒，让投机钻营者得利，严重挫伤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劳民伤财，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耗费大量国家财力；形成腐败土壤，缺乏严格规划和监管的程序漏洞，容易给贪占者造成可乘之机。

形式主义来源是唯心主义

形式主义看似是工作作风问题，本质上是思想问题、党性问题。其根源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党性修养缺失。

从思想根源看，形式主义源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毛泽东曾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一些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不扎实，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凭主观意愿和想象判断事物，只讲一般原则、提空洞要求，却拿不出管用的办法，将工作出发点放在迎合上级、追求个人名利上，而非解决实际问题。

从价值根源看，形式主义源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扭曲的表现。功利主义者从私心私利出发，将个人升迁、局部利益作为核心追求，忽视实际成效和人民根本利益。实用主义者过于关注短期效果，忽略需要久久为功的政绩。

从党性根源看，形式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直接体现。一些党员干部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把权力当成风光和享受，把岗位当作装点门面的工具。这种党性缺失，必然导致政绩观扭曲，把心思花在虚张声势上，把工作定在欺上瞒下中。

总之，形式主义的本质是党性修养不足、宗旨意识弱化的外在表现，深层症结在于政绩观的根本错位。

力戒形式主义，要靠正确政绩观

力戒形式主义，根本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筑牢思想根基，校准政绩观坐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党员干部要牢记权力和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做显功，也做潜功，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后的真评价。

坚持实事求是，弘扬实干作风。从实际出发，用好调查研究基本功，使政策方案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科学。立足当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着眼长远谋划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和“形象工程”。察真情、出真招、求实效，杜绝口号式、包装式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把工作做实做细。

完善考核机制，树立鲜明导向。优化干部考核体系，增加民生改善、群众满意度等实绩权重，让踏实干事者受重用，让搞形式主义者无利可图。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精简文件会议，统筹督查考核，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桎梏中解脱出来。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抓住“关键少数”，发挥表率作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查摆、纠正形式主义，把自己摆进去、把根源挖出来，善于从基层问题中倒查原因，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畅通监督渠道，对形式主义问题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

形式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根治形式主义，非一日之功。抓住了政绩观这个根源，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形式主义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是为民造福、尊重规律、注重实效的政绩观。

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虚浮之风，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要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马在线

出海短剧不应只有“霸总”

房雨露

近年来，以“霸道总裁”为代表的国产微短剧在海外异军突起，成为文化出海赛道上一匹不容忽视的“黑马”。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8月，海外微短剧市场总收入达15.2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倍；应用总下载量突破7.3亿次，增幅超过370%。亮眼数据背后，是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规模化生产能力与市场响应效率的一次集中展示。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不容回避：短剧出海，能否在赚得真金白银的同时，为世界留下足以跨越文化壁垒、沉淀为长久认同的“文化留量”？

微短剧出海，以市场逻辑取胜。这类作品节奏紧凑、冲突密集、情感张力十足，精准契合数字时代全球用户对碎片化、高浓度娱乐内容的消费偏好。从选题策划到剧本创作，再到精准投放，一套成熟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展现了中国文化产业在垂直赛道上高效的执行力与规模化能力。

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商品，商品能走出去，在大众文化市场攻城略地，本身就是综合国力的溢出。正如好莱坞

大片曾以成熟的商业叙事席卷全球，今天的中国短剧也正在用市场语言叩开世界的大门。

但成也市场，困也市场。为追求传播效率，大多数作品剥离文化语境，将叙事压缩为“逆袭快感”“宠溺甜蜜”“冲突刺激”等情感模板。这种“快餐式”处理，固然能迅速捕获眼球，却难以承载真正丰富的文化图景。当“中国故事”被简化为“霸总”与“灰姑娘”的全球通用脚本，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比如“仁者爱人”的伦理底色、“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都在这一过程中被稀释。

短剧出海的热潮，既是数字文化产业的势能，也暴露出价值表达的阶段性短板。

反观美式英雄叙事，始终贯穿着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意志等一套完整价值输出，曾长期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青年。我们的短剧若只满足于“爽感”刺激，而放弃价值表达的主场，那么即便坐拥海量流量，也不过是文化版图上一阵喧嚣的过客。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体精神焦虑、人际关系疏离等全球性议题，中国传统智慧中蕴含的哲学思辨、生命美学与社群伦理，具有解答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时代价值。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文化基因转化为全球观众能够共情的当代故事。

文化传播是从接触到共鸣的系统工程。一方面打破题材内卷，短剧不应只有“霸总”，更应让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历史人文乃至未来想象的多元叙事进入人物命运；另一方面完成高水平的文化转译，警惕语言转换中的价值流失，用世界听得懂的叙事方式，传递东方的情感结构与生活哲学。

流量是起点，留量才是远方。只有“霸总”之外响起更多元的声音，世界在“爽剧”之外触摸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文化出海才算真正完成了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的跨越。让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实现双赢，这也是中国价值为世界贡献新表达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英雄不是“天选之人”，而是“身边凡人”

陶维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这句话点明了英雄与时代的内在关联，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一个告别了神话史诗、日益走向平权的现代社会，英雄精神何以可能？它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当我们谈论“英雄的城市”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纵观人类文明史，对英雄的界定从未凝固。西方语境中，英雄从古希腊半神式的阿喀琉斯，到卡莱尔笔下引领群众的先知、君王，经历了一个从神坛走向人间的过程，核心在于个体意志的超凡力量。而在中华文明的脉络里，英雄形象始终与“德行”和“事功”紧密交织。刘劭在《人物志》中以“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是智与勇的兼备；但更深层的文化认同，则赋予了英雄以“仁”为本的底色。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更将英雄与爱国主义牢牢绑定，林则徐的生死以之、鲁迅笔下的“中国脊梁”，无不是将个人命运熔铸于国家大义之中。

步入现代社会，英雄的认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祛魅”。它不再仅仅是宏大叙事中的完美形象，而是变得多

元、内在，甚至带有“烟火气”。今天的英雄，可以是攻克关键技术领域的科学家，可以是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也可以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英雄的定义从“天选之人”扩展到“身边凡人”，但这并非价值的消解，而是英雄精神的普遍化——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英雄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祇，而是每一个在极限挑战面前，选择担当、迸发勇气的个体。东西方英雄观的差异也在此凸显：西方英雄叙事更强调个人主义的拯救，而中国语境则更崇尚集体主义的“众志成城”，将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照亮时代的火炬。

这种英雄精神的集体性，最生动地体现在那些被冠以“英雄”之名的城市身上。城市不仅是地理的空间，更是精神的血脉。以武汉为例，三千多年的建城史，从盘龙城青铜文明，到辛亥首义的枪声；从抗洪抢险的军民同心，到抗击疫情时的坚韧不屈，城市的发展脉络就是一部英雄的诗史。这座城市为何能屡仆屡起，愈挫愈勇，关键在于，一代代英雄个体的事迹，已沉淀为城市的文化基因，凝结成“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

精神特质。

英雄城市精神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对历史的总结，更在于它是对未来的召唤。新征程上，这种精神正是将历史荣耀转化为实践力量的关键枢纽。它让我们理解，英雄并非凭空而降，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今天，我们弘扬这种精神，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缅怀和赞颂，而必须将其融入城市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武汉来说，英雄精神还体现在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勇闯无人区，把各项发展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将“勇于担当”的大局意识，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行动。将“坚韧不拔”的斗争品格，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动力。将“追求卓越”的竞进姿态，升华为一种城市气质，涵养各行各业从业者精益求精，让武汉成为各类人才近悦远来的高地。最终，这种精神的践行者，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无论是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还是普通市民的默默奉献，都是构成这座城市“英雄气”的基石。

(作者为武汉市社科院文化与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调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融合不是“拼盘”，是“化学反应”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融合发展，是指通过数字技术、产业组织、要素配置等多维度融合，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形成互联互通、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系统。“十五五”时期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产业叠加或技术应用，而是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深刻变革，是适应新科技革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放眼未来五年，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合发展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迎来一系列重大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数字融合赋能。

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建设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实现设备、数据、应用互联互通。加速数字产业化创新，突破关键数字技术，建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软件等数字产业先导区，推动数据资源化、资产化，建设国家级数据交易市场 and 流通体系。

——产业链协同融合。

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构建产业协同网络，围绕重点产业链，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推广供应链协同平台，实现需求、库存、物流信息实时共享。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广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定制化服务等新模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融合型未来产业。

瞄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融合方向。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布局一批融合创新试验区。

——区域融合生态。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精尖融合型产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本地特色融合，支持老工业基地“产业+城市+生态”协同更新。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融合型产业集群。

——融合不靠“单打”，靠“系统作战”

当然我们要看到，融合化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会充满艰难险阻，需要我们熟练掌握并善用重大原则及其方法论。

首先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各地应修订不适应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定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条例。以数据接口、平台互通等领域为例，可以开展“沙盒监管”试点，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

其次要善用系统思维，突出发挥联合、联动、联结的作用。融合化不是单打独斗，不可能单兵突进，要强调全国一盘棋，进一步打破地方壁垒和行政分割局限，努力建设国家、区域、地方三级多元投资、分工协作、灵活运营的算力体系，大幅提升有利于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平。比如我们可以树立形成若干个国际领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目标，主导制定一批产业融合国际标准，建成一系列“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标杆等。既系统谋划，又层层分解落实，让“融合化”从概念变成现实抓手，从顶层设计变成各地现实发展图景。

再就是要坚持重点论与全面论相结合。融合化不是一个框，什么都往里装，不是搞大杂烩。比如说智能制造、智慧能源等领域，要成为我们进行融合技术突破的重点领域，力争打造若干个“链主+配套”协同创新联合体，形成一批万亿级世界级融合型产业集群，建设若干国家级共享工厂、共享实验室等平台。以数据接口、平台互通与评估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数据经纪机构。通过重点攻坚，力争重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50%以上，产业融合对GDP增长贡献率达25%以上。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融合化发展，让产业“链”上未来

曾刚